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意識形態競爭的理論性初探—「歷史會有終結嗎？」

Theoretical Discussion on Ideological Competition - "The End of History?"

doi:10.30390/ISC.199707_36(7).0005

問題與研究, 36(7), 1997

Issues & Studies, 36(7), 1997

作者/Author：王光正(Kung-Cheng Wang)

頁數/Page：73-85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7/07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707_36\(7\).0005](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707_36(7).000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意識形態競爭的理論性初探 ——「歷史會有終結嗎？」

王 光 正

(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摘 要

本文以經濟學的觀點解釋意識形態的形成、擴展及競爭。並以此架構推論歷史可能之終結。在意識形態發展及競爭的理論上，本文借用諾斯(Douglass C. North)的經濟史觀點；在終結論上，本文提出二個滿足終結的必要條件——效率性及總合一致性。以現今所已知的各種意識形態中，本文認為最滿足上述條件的為自由主義。

關鍵詞：意識形態、效率、競爭、總合一致性。

* * *

壹、簡 介

一、終結論的爭論

歷史是否會有終結？這一命題長久以來一直為歷史學者及哲學家們所爭論。一九八九年時，一位日裔美人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美國新保守主義派雜誌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上發表一篇文章，名為「歷史會有終結嗎？」(*The End of History?*)^①由於當時福山本人任職於美國國務院政策策畫小組主任，並且又在美國的脫口秀節目中闡述其觀念。所以福山的論點很快地在美國新聞界及歷史界引起討論。^②

* 作者感謝台大經濟系熊秉元教授給予的指導。台大哲學系林火旺教授、陳更生及萬聖德先生在作者寫作時亦多所協助，謹此一併致謝。

註① 引自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New York), Summer 1989, pp. 3~18.

註② 李豐斌，「人類歷史終結的開始——福山簡介」，*歷史月刊*(台北)，第十二期，民國七十八年，頁一三八~一三九。

福山在文章中指出，馬克斯及其信徒都誤解黑格爾哲學，以至於將唯物論置於唯心論之上。福山認為唯心論中所提之理念（idea）和意識（consciousness）才是真正主導人類歷史的主因，物質層面不僅不是「上層結構」，反而是理念和意識所決定的「下層結構」。因此福山採用黑格爾的唯心論，認為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意識形態競爭史，認為歷史將終結於西方之自由主義。福山認為人類的歷史在一八〇六年就已結束，原因是意識形態的演化在那時已經結束，自由主義化為美國或法國的革命理想。然而自由主義成為人類的主流意識形態後，並不是一帆風順在人類的歷史中暢行無阻。福山認為在二十世紀時自由主義遇到兩個最重要的敵人，一個是法西斯主義，另一個則是共產主義。法西斯在二次世界大戰時被打敗，而共產主義則在一九八九年的東歐民主化運動中被丟入歷史的灰燼中。^③

福山的這種看法，引起廣大的爭議，這些批評有的從歷史證據反駁福山的觀點，有的則從哲學或邏輯上質疑福山的論證，簡單來說可歸於下列四類：

第一、冷戰的終結絕不意味國際間政治、意識形態、外交、經濟、技術，甚至軍事對抗的全面終結；也不意味著爭權奪勢的局面結束。它很可能意味著國際局勢更加動盪、難料、暴亂。小區域國與國間的衝突在冷戰後並沒有停止的跡象，^④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的衝突也可能增加。^⑤

第二、一套理論或意識形態可能在一代消退，卻在一兩代後再度出現，並且恢復活力。自由主義在一九八九年東歐民主化中，雖然戰勝共產主義，但在中東仍受著回教基本教義主義（Islamic fundamentalism）的挑戰，若說歷史已步上終結之路，似乎言之過早。^⑥

第三、福山的論證是建立在黑格爾的「歷史主義」及其辯證法上。直至今日為止，我們很難檢證人類的歷史發展真如黑格爾所言。^⑦即使歷史的發展過程真如黑格爾的「歷史主義」，其是否會終結在「自由主義」上也令人質疑。況且在第三世界中，所謂的「自由主義」是西方世界眼中的自由民主基礎，和第三世界所認知的自由民主基礎並不相同。^⑧這種對「自由」、「民主」認知的分歧也反應在已瓦解的東歐共產陣營中，在他們邁向民主的過程中，對「民主化」（democratization）一詞的認知也

註③ 讀者若對福山的論點有興趣，可進一步參閱：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2)。

註④ Peter Nulty, "How the World Will Change," *Fortune* (Switzerland), Vol. 15 (January 1990), pp. 22~26.

註⑤ Stanley Hoffmann "A New World and Its Problems." *Foreign Affairs* (New York), No. 69 (Fall 1990), pp. 115~122.

註⑥ 同註⑤, p. 115; Ali A. Mazrui, "The Resurgence of Islam and the Decline of Communism: What Is the Connection?" *Futures* (United Kingdom), Vol. 23, No. 3 (Apr. 1991), pp. 273~288.

註⑦ Alan Bloom, "Response to Fukuyama," *The National Interest* (New York), Summer 1989, pp. 19~21.

註⑧ Richard Peet, "The End of History—or Its Beginning?"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Washington), Vol. 48 (Nov. 1991), pp. 512~519.

有很大的爭議。^⑨

第四、「終結論」有其邏輯上之弱點：今日之人無法預知未來，又怎知未來之人會遵循今日之人的想法。^⑩

總之，這些批評者認為，歷史有太多的可能，歷史可能一再重演，歷史也可能曇花一現。歷史上可能有過一敗塗地的情形，卻沒有終結的解決辦法。^⑪

二、本文的分析方法

福山提出的「終結論」雖有其原創性，但並沒有明白地告訴我們，歷史終結的過程。福山信心滿滿地引用黑格爾的哲學和史學觀點，告訴我們歷史終結的必然性。但我們卻無法了解，即使歷史會有終結，那為什麼會終結在自由主義下。因此本文嘗試以經濟學的分析方法提出一種解釋，希望解釋：(一)意識形態在人類歷史上的地位。意識形態的建構，意識形態和制度及生產間的關係。(二)意識形態間的競爭。意識形態的演化、傳播與退卻。(三)人類的歷史是否會有終結？而這終結是否會在自由主義上。

所謂「歷史的終結」，福山指的是「意識形態的終結」，而不是指人類歷史的停止前進。本文援引福山的觀點，^⑫作者認為「歷史的終結」，應是指意識形態達成一個動態穩定的均衡 (stable equilibrium)。達到此均衡時並不排除失衡 (disequilibrium) 和波動 (fluctuation)，也不排除穩定的成長 (steady state growth)。這個意思是說，所終結的意識形態在終結的時點及其後歷史上，並不因此均衡的達到而停止接受挑戰及修正。但在歷史的發展主軸上，所終結的意識形態仍俱主導的地位，且這個意識形態的目的性和本質不再改變。^⑬以經濟學的方法分析意識形態和制度方面的研究，在經濟學界首推諾斯 (Douglass C. North)。因此本文以其著作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Theory*)^⑭作為分析的基礎，在分析架構上，本文在第二節中，先以新制度學派 (New Institutionalism) 的觀點^⑮討論意識形態在人類歷史上的地位，並提出在自給自足下的基本分析模型。在第三節中，本文以第二節所建立的模型，討論意識形態間的競爭，其中包括影響意識形態競爭的條件 (意識形態的規模)，和競爭中優勝劣敗之決定 (效率差異)。在第四節中，討論意識形態競爭可能的結果——「歷史的終結」，並分析如果這個結果可以達成，它必須滿足

註⑨ Russell Bova, "Political Dynamics of the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World Politics*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Vol. 44 (Oct. 1991), pp. 113~138.

註⑩ Bart Van-Steenbergen, "The End of History as a Self-Denying Prophecy." *Futures* (United Kingdom), Vol. 24, No. 7 (Sept. 1992), pp. 711~716.

註⑪ 本文並不是要為福山辯解，而是從另一個角度去探討「終結論」的可能性。

註⑫ 關於福山對歷史終結之定義可參見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pp. 3~5; 或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Preface, pp. 1~5.

註⑬ 這樣的定義可以避開註⑩之 Van-Steenbergen 對「終結論」的批評。

註⑭ Douglass C.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81).

註⑮ 諾斯對歷史發展的解釋，一般而言被歸於經濟學中的新制度學派。

那些條件，並論證自由主義是目前最符合這些條件的意識形態。最後第五節為結論。另外為了佐證本文的推論，本文亦參考一些歷史學上的著作，如黃仁宇^⑥、甘乃迪（Paul Kennedy）^⑦等。

值得一提的是，本文分析上並不以人身因素（personal factor）為討論重點，而著重在非人身因素（impersonal factor）上。因為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歷史上英雄豪傑的個人特質相對而言顯得微小，聖賢偉人固可天賦異秉引領一時之風騷，但如果不能和歷史條件相符，則其功業終如曇花一現。這是本文在建構以下模型時，對歷史發展所抱持的態度。

貳、意識形態的建構

一、意識形態的形成

我們想像一種原始草莽的人類社會，在這種社會類似霍布斯所言「人獸相食」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人類生活的目的有二個，一個是如何活下去，其次是在能活下去的前提下，人們思考如何活得更好。^⑧開始時人和人之間可能以弱肉強食的方式競爭，因為攫取別人現成之所得，往往比自己從事生產和採集來得容易。但是人們不久就會發現，這樣的相互間搶奪所得並不穩定，因為任何一個人（或集團）都無法保證自己在搶奪生活中的相對強弱。不久以後，人們會發現以合作的方式取代相互搶奪其所得會比較穩定且長久。這大概就是一般社會契約論所闡述的情形。

但人類的社會組成分化並沒有那麼簡單，除了在物質層面上的滿足，尚需建立一套自我認知的系統，幫助其理解並處理日常生活中的大小瑣事。我們通常稱這樣的系統為社會規範。然而決定社會規範的因素，我們稱之為「意識形態」。這就是曼罕（Mannheim）所說的「社會決定因素」（social determination）或「社會條件」（social condition），也就是在團體生活與社會情勢中思想的起源。^⑨這個概念類似於韋伯（Max Weber）所提的奇理斯瑪型（charismatic）權威，該指一種天賦特質，或者一種可提供秩序性和穩定性的權威體系。^⑩

註⑥ 黃仁宇，*中國大歷史*（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八十二年）；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八十二年）。

註⑦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87), pp. 21~331, 647.

註⑧ 這是本文對個人行為動機的基礎假設。

註⑨ Isaac Kramnick and Frederick M. Watkins, *The Age of Ideology—Political Thought, 1750 to the Present*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79), p. 2.

註⑩ 這個概念由韋伯提出，林毓生加以闡釋。關於韋伯之原意，見葉啟政主編，*當代西方思想先河*（台北：正中書局，民國八十年），頁二三〇；關於林毓生闡釋部分，見林毓生，*思想與人物*（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七十八年五月），頁一一一——一一七。

意識形態的概念，由以上的闡述我們不難理解，但從個人的角度來看，意識形態提供了「有限理性」的選擇憑據，在眾多紛擾難解的現象中，意識形態建立個人思維公平正義、道德、及倫理判斷的認知依據。^①但從個人與個人間的關係來看，意識形態則提供了一種交換的穩定性。這種穩定性在商品交易時提高了交易雙方和約履行的可能性，促進交易的達成。從這樣的概念中，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何在現代商法概念缺乏的傳統中國鄉村地區，基本的商品交易仍可達成，因為透過傳統儒家思想對守信道德的要求，和地方宗族的安定力量，使得交易時的口頭承諾比文字契約來得重要。雖然缺乏詳細的文書契約及民商法系統，但交易在大部分的情況仍可順利達成。^②

如果交換義涵不限定在物質上，廣義的交換包含生活經驗、婚姻、和信仰等等。則相同的意識形態增加了交換和穩定相處的可能性。初次接觸不同的意識形態的個人或團體，可能會增加生活經驗或智能上的豐富性，然而長久相處下來往往會覺得格格不入。例如生活在自由民主國家下的人民，可能會對共產世界下的生活感到好奇。但是要叫自由自在慣了的個人，習於共產國家的嚴密監視和家常便飯的鬥爭生活，這可能就不是人人可以勝任而且願意的了。同樣地，如果要讓一個習於極權統治的個體，容忍不同的意見和家常便飯的示威遊行，也不是三天二天就可適應的。施添福教授曾對蘭陽平原的開發過程作深入的研究，在其研究結果中有個耐人尋味的例子。在蘭陽平原的開發過程中，噶瑪蘭三十六社（原住民之部落）中大部分皆隨著漢人的移入而漢化，經過長時間的通婚和漢人的移入，在這三十六社原社址上已很難找到或區分出原本的原住民。然而其中有一支奇立丹社卻是例外，在漢化的過程中奇立丹社並沒有和漢人通婚，原社址亦被保留（漢人並沒有移入其社）。原因是因為意識形態和風俗習慣相差太大，奇立丹社的原住民認為，家族成員雖已過世，但其靈魂仍和在世的家族成員長相左右，因此奇立丹社的原住民在其親人死後，皆將其親人葬於住宅之左右，這種習俗和漢人相差過大，因而阻礙了二個不同文化的通婚與融合。^③從這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如果二個族群意識形態和習俗相差過大，會阻礙一些非物質性的交換，如通婚、生活經驗……等。

如果我們從社會學中結構功能學派的觀點來看意識形態，則意識形態對於單獨的個體，具有一種對社會規範的認知過程。也就是說一種意識形態對於其所信仰的社會族群具有一種統轄支配的能力。而每一個單獨的個體亦透過其信仰的意識形態，去解讀這紛紛擾擾的惱人俗事。因此相同的意識形態可以降低交易時（包含各種形態的交易）的交易成本及不確定性，促進交易的達成。因此在意識形態形成時，本身具有規模報酬遞增（increasing return to scale）的特性。原因在於愈多的個體接受了相同的意識形態，一方面增加了交換的豐富性；一方面也增加了意識形態的穩固性，意識形

註① 同註④，pp. 48~49。

註② 見黃仁宇，中國大歷史，頁三四，一六七~一七九，二七〇~二七三；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頁四一一~四二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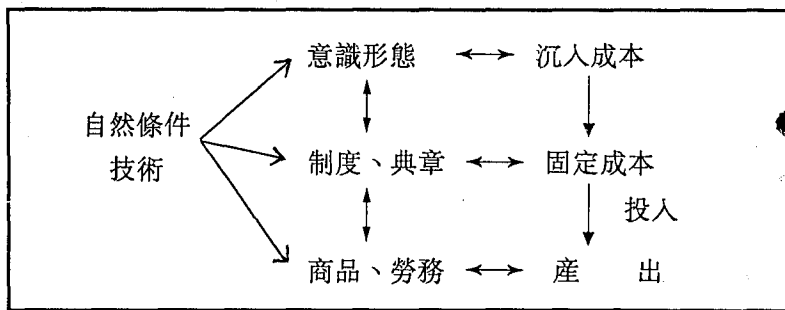
註③ 施添福，「蘭陽平原傳統基層社會空間的形成及其演變」，未發表之論文（台北），民國八十五年，頁六~八。

態的穩固性又促成了交易的穩定性。但不同的意識形態間卻呈現不同的面貌，不同的意識形態間類似不同的廠商或產業，彼此具有相互競爭的特性。詳細的競爭過程我們將在第三節討論。

二、自給自足體系下的意識形態

接著我們討論在一個自給自足的體系下其意識形態如何形成。我們可以由圖一看出，意識形態在人類的社會結構中是屬於較上層的结构，意識形態的形成影響了典章和制度的建立，而不同的典章和制度又影響了這個自給自足的商品和勞務產出。原則上意識形態決定了典章和制度，而典章制度決定了商品、勞務產出的種類和形態。在這個過程中，自然環境^②或是體系內的技術水準^③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不同的自然條件和技術水準，使得每一個族群在面對不同的生存壓力時，產生不同的對應之策，這不同的對應之策的合理化體系就是各種不同文化或是意識形態來源。然而在這「意識形態—典章、制度—商品、勞務」體系建立之後。意識形態和典章制度並不是呈現完全穩定的形態，有時因為自然條件和技術的改變，典章制度與意識形態會做局部的修正。只要整個體系所面對的衝擊改變不是太大，意識形態和典章制度是站在原有的基礎上做修正。因此我們可以在圖一「意識形態—典章、制度—商品、勞務」的關係中看出，它們的影響是交互作用而不是單方向的。

圖一 「意識形態—典章、制度—商品、勞務」關係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在大航海世紀^④來臨前，人類大部分的意識形態皆具有上述特質。在中國^⑤最重要的意識形態就是大一統思想和儒家文化，大一統思想的來源據黃仁宇的看法原因有二個，^⑥一個是黃河的不定期泛濫，另一個則是長久以來北方游牧民族不定時的侵擾。大一統的國家對於黃河的整治，和黃河泛濫時期移災民異地而食的工作比起分

註^② 這自然條件包涵了地形、氣候、雨量 and 對外關係。

註^③ 這裡的技術泛指知識的存量。

註^④ 一般而言以麥哲倫航行地球一圈做為分界點。

註^⑤ 在大航海世紀來臨前，整個中國和文後討論的歐洲皆可視為不同的自給自足體系。

註^⑥ 見黃仁宇，中國大歷史，頁二〇～二一，二六～三一，五一～五二。

裂的國家來得有效率。同樣的在面對北方民族不定時的侵擾，統一的國家比起分裂的國家更容易派出穩定的常備軍來戍守長城及邊疆要塞。從長時間的歷史角度來看，我們不難發現，大一統局面的來臨，同樣也是儒家文化支配中國，和單一典章制度時代的來臨。儒家文化因其強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訴諸道德所形成的社會秩序。比起法家的繁瑣帝國法律，更適合古代技術不發達的中國社會。換句話說，儒家文化是在當時的條件下，成本最小而能達成帝國單一化^②的意識形態。再加上中國境內種族的齊一（大致上皆為漢民族）和地形的完整（相對於歐洲而言），這使得歷史上中國雖有分裂的局面出現，然而歷朝各代幾乎沒有一個君主不以統一中國為己任。

相對於東方，西方歷史上自異族入侵，西羅馬帝國滅亡後，就沒有大一統思想和統一的帝國出現，^③從自然條件來看，歐洲的地形並不完整，種族亦不單純，有法蘭西民族、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土耳其人、盎格魯薩克遜人……等。如果再加上流亡的猶太人和吉普賽人，歐洲的民族構成簡直五花八門。這種地形和人種上的歧異，使得西方世界主流思想始終是均勢而不是大一統。從歷史上我們看到幾個國家在其國力強盛時，其在位君主儘管有征服歐洲之野心，但皆因受均勢思想的影響，被其他各國的群起反抗而終告失敗。如十六世紀的哈布斯堡帝國^④、十七世紀及十九世紀初的法國^⑤、十九世紀的英國^⑥、二十世紀的德意志帝國^⑦等。因為自然條件缺乏大一統的條件，除了基督教思想外，歐洲各地呈現一種多元的面貌，我們雖說中世紀的歐洲為封建制度下的莊園社會，但我們卻不得不承認，在威尼斯，熱內亞，佛羅倫斯等自由城市，有著資本主義的徵貌。我們也很難將在君士坦丁堡的東羅馬帝國和回教世界下的西班牙，與我們典型的西歐中世紀概念相連結。因此從上面的例子中我們可以了解，在一個所謂自給自足的環境中，自然條件影響了「意識形態—典章、制度—商品、勞務」結構的建立，也因為世界各地各民族所面對的自然條件不同，才使得各地「意識形態—典章、制度—商品、勞務」的結構不同。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在圖一的「意識形態—典章、制度—商品、勞務」結構中，意識形態對於其所信仰的族群而言是最不容易改變的，其次是典章制度，最後才是商品和勞務的種類。這種關係就像在博奕理論（Game Theory）中，為了參加多次賽局（multiperiod game）中所投入的沈入成本（sunk cost）、固定成本（fixed cost）和產出（output）。因此我們可以在圖一的右側看到，意識形態對應著沈入成本，典章制度對應著固定成本，而下層的商品和勞務則對應著產出。透過經濟學的概念，我們可以從上述的對應關係中了解，要更改一個體系的意識形態其機會成本最大，其次是典章制度，最後才是商品和勞務的種類。這樣我們可以清楚的解釋中國歷史上自大一統以後，由自然條件或是技術的改變所引起的變革壓力，其改革往往不涉及意識形

註^② 帝國的單一化能讓上述黃河泛濫及遊牧民族問題更容易解決。

註^③ 同註^①，pp. 21~31.

註^④ 同註^①，pp. 21~70.

註^⑤ 同註^①，pp. 76~115.

註^⑥ 同註^①，pp. 143~198.

註^⑦ 同註^①，pp. 249~333.



態，而只就典章制度上作文章，或在原有的意識形態上做發揮。如王莽的托古改今，或如王安石變法圖強卻不觸及意識形態(但其守舊派政敵卻常拿祖宗家法來與之對抗)，直至清季同治中興、百日維新亦要強調「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以儒學為張本。^⑧或如各朝代武裝鬥爭中各軍事領袖，都要不斷強調天命在其身(受儒家文化天人合一，天子受命於天之影響)。這種情形在鄧小平上台後的中國大陸也可見到，明明許多政策是行資本主義之實，卻硬要以具「中國社會主義色彩的市場經濟」稱之。由上面幾個事例我們不難理解，為何意識形態會對應著沈入成本，典章制度對應著固定成本，而商品和勞務則對應著產出。因此意識形態的建立，就是該族群生產方式的建立。

叁、意識形態間的競爭

一、意識形態的規模

前節我們討論了自給自足體系下意識形態建構的過程，接下來我們探討二個或是數個自給自足體系，一旦開放競爭或是進行貿易，其意識形態所受到的衝擊。意識形態和諾斯所言的「制度」相同，本身具有規模經濟(economy of scale)。^⑨其因在於一種意識形態決定了一種生產及交換結構，當信仰同一種意識形態的社群愈龐大，時間愈長久，此社群所投入的沈入成本就愈大。因此和諾斯所言的「制度」一樣，本身具規模經濟的特性。

意識形態本身雖具有規模經濟，但是在同一個意識形態下自給自足體系的最適規模卻會受到技術的影響。原因在於：

第一、不同的技術水準影響意識形態的傳播範圍：我們可以在人類的歷史上看到，因為馬匹獸力的使用，使得人類的社會結構由氏族部落邁入王國或帝國形態；同樣地，初期的航海技術也使得近海殖民成為可能^⑩。這說明了意識形態或是制度的外溢過程，當時的技術占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第二、技術不僅影響意識形態和制度上的傳播，它還影響其本身在其影響範圍內的效率性。^⑪舉例而言，古希臘雅典被歷史學家公認為民主之濫觴，但我們很難想像如果把非雅典公民，但占雅典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俘虜奴隸或婦女亦給予公民權，^⑫

註⑧ 這二次自強圖存對儒學的依賴程度有別。

註⑨ 規模經濟是指，廠商的規模愈大，平均成本愈低，當固定(或沈入)成本提高，邊際成本不變時，即可達到規模經濟。

註⑩ 羅馬帝國、威尼斯、熱內亞等皆曾在地中海周圍建立殖民地。

註⑪ 這裡我們並不想陷入是意識形態決定技術，還是技術決定意識形態的爭論，我們所要談的是在給定意識形態下技術對其之影響。

註⑫ George H. Sabine & Thomas L. Thorson,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1973), pp. 20~21. 雅典公民不包括奴隸(約占人口三分之一)、婦女(亦約占人口三分之一)、及非雅典籍人士。

雅典的民主政治還能具有相當的效率性。或是想像雅典有一天統一了希臘各城邦，結果各城邦皆行雅典式的民主政治，以當時的技術水準，各城邦間在討論希臘的整體問題時，仍能像雅典治理雅典城時那樣無礙順行。簡言之，紀元前的技術水準，只能讓民主政治的效率性維持在城邦政治之中。這也可以解釋在羅馬帝國擴張後，由城邦共和轉成帝國帝制的必然性。^④

簡單的說，上述的二個影響套用經濟學的話語可解釋為：在產量增加後（意識形態擴張後）是否還能保持規模經濟（意識形態的效率性）？而保持規模經濟（意識形態的效率性）的關鍵在於技術。

二、不同意識形態間的競爭

在此節中我們主要討論不同意識形態間的競爭，及其間的轉換。諾斯在他的《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一書中強調，當人們的經驗與其意識形態不相符時，他們就會改變其意識形態觀點。但是類似孔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的觀念相似，必須累積了相當的特例後人們才會進入一個新的典範，接受一個新的意識形態。^⑤在本篇報告的結構中，我們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因為意識形態在個人生命社會化的歷程中，扮演了基礎性的角色，它是一個人研判是非對錯的思維法則。以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要讓一個廠商短期停業，除非其虧損大於固定成本（制度）。如果是一個多期的賽局，則必須讓虧損大於沈入成本（意識形態），才會促使一個理性的經濟個體改變沈入成本，以另一種生產方式生產。所以不同意識形態間的競爭，不具效率的一方必須累積相當大的差距，不具效率的一方才會接受另種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因此意識形態間的轉換應該也是跳躍式的轉變。

從上面的基礎模型，我們可以解釋，為何中國的西化過程需要歷經鴉片戰爭和二次中英法聯軍後，才有同治中興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要歷經馬關條約的屈辱和八國聯軍的全面潰敗後，中國才知學習西方的「君主立憲」，而孫文民主革命的運動也在此時才能成功的希望。其關鍵在於中國對於鄰國向來是文化及意識形態的強權，在歷史上異族雖曾在不同時代征服過中國，但從來沒有一個異族在征服中國之後能不融於中國的文化、典章制度、及意識形態。在歐洲帝國主義來臨前，中國文化支配其周遭生活領域的角色，使得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要認知到其自身「意識形態—典章、制度—商品、勞務」結構的無效率性，所付出的代價必須更大，迫其變動意識形態的機會成本也就愈大。這機會成本反映了，幾千年來歷朝各代為維護穩定生產，消費及生活，所付出的沈入成本。

從這個角度也可清楚的看出，為何同時期的日本在「明治維新」後，能全盤且快速地接受西方較有效率的「意識形態—典章、制度—商品、勞務」結構，並在二十世

註④ 這裡的意思是指當帝國規模擴張後，在當時的技術水準下，會使得重視人本精神的民主政治變得較不具效率性。

註⑤ 同註④，p. 49.

紀初期成爲亞洲的強權。其關鍵在於日本向來爲一文化的接受國，其對於意識形態所付出的沈入成本較低。在意識形態的轉換時所需的機會成本（虧損）較中國來得小，因此在歷史的進程上能較中國接受西方的「意識形態—典章、制度—商品、勞務」結構。^②這和一般歷史學家對此問題所提出的解答——島國文化，較易接受外界之資訊與生產方式，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同樣地在一九八九年的蘇聯及其東歐附庸，在一夕間解體，也是因爲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在四十年的競爭後，其間所累積的效率性差異大過信仰共產主義之沈入成本，共產帝國的瓦解才爲可能。我們可以從戈巴契夫在一九八六年蘇共第二十七次黨代表大會的發言看出：^③

「七〇年代，經濟困難開始加重，經濟成長率明顯下滑，結果是黨綱中規定的經濟發展目標未能實現，甚至連第九個五年計畫及第十個五年計畫規定的較低目標也未能達到。因而科學、教育、衛生、文化和生活服務等動質基礎發展遠遜於預期。」

「雖然我們全力投入，但是尚未能完全扭轉情勢。工程技術、石油、煤炭、電子工程、鐵類金屬以及化學藥品等基本建設方面都非常落後。主要經濟效率指標和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的目標也都沒有達到。」

「在我們所面臨的所有問題中，不管是近期還是遠期的，是經濟還是社會的，是政治還是意識形態的，是國內還是國外的，最重要的就是要加速我國的社會經濟。」

在冷戰對抗四十年後，共產主義並沒有打敗資本主義，蘇聯不僅在高科技產業落後西方世界，甚至連農業，基礎工業，能源工業和勞動力都呈現衰退。這種效率上的差異在擴大到一定程度後，造成一九八九年的蘇聯瓦解和東歐易幟，全面向西方世界看齊。因此一九八九年共產世界的瓦解，並不是歷史的偶發事件，而是二種意識形態效率差異過大後的跳躍式變革。

肆、歷史的終結

由以上的推導我們可知，如果人類的歷史有終結，則應終結在意識形態上。因技術進步之故，沒有一種意識形態能像大航海時代前那樣閉關自守，形成一個自給自足的體系，透過大規模的國際貿易，世界上的任一個國家或任一種意識形態，都不能逃避接受其他國家或意識形態的競爭。長遠來看，這種競爭會增加全體人類的福祉，也促成了人類歷史的終結，人類的歷史不會終結在單一事件上，而會終結在單一^④且最具效率的意識形態上。

註^② 我們在這裡所談的接受是指結構的主體性，而不是指完完全全的放棄自己過去所有的。

註^③ 同註^①，p. 647.

註^④ 單一意識形態乃是其本身具有規模報酬之故。

而終結的終點到底在何處呢？作者認為終結的終點一定要滿足總合一致性（aggregate consistence）。^⑥從黑格爾的辯證法來看，任何體系內只要有矛盾的發生，就會有正反合鬥爭的過程，體系就會進行自我崩解。而總合一致性是目前已知去除體系內矛盾最有效之標準，在滿足總合一致性下，任何總體現象的出現都隱含個體最適化的行為。這使得具有總合一致性的意識形態，其體系會將內部矛盾內化自我調整，不致惡化成顛覆整個體系的破壞力量。

以目前看來，自由主義是人類自信史以來最具總合一致性的意識形態。為什麼呢？我們可以從以下自由主義的一些特性中看出。自由主義發展至今雖派別林立，但有幾項原則是共通的：^⑦一、認知且尊重個人的差異性（包括身體上及思想言論上）。二、個人間的差異性使得每個人在生命理想上表現不同。三、理解在個人差異的現實上，個人為達成生命理想上，其間行為可能會彼此衝突。四、國家或政府的決策，應受中立原則（neutrality principle）的規範，以讓各種價值觀機會均等地發展及協調價值觀間的衝突。

因此，以自由主義為意識形態所形成的社會規範或政制，無論是以傳統的社會契約或是由晚近羅爾斯（John Rawls）的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⑧來達成，皆是以尊重個人，讓個人獲得最大滿足出發，來建立可依循遵守的共識。也因此自由主義是目前已知的意識形態中最具總合一致性的意識形態。

一般人總將自由主義和分權民主政治及資本主義完全畫上等號。其實不然，外在和內在條件的改變，皆會使得以自由主義為基底的社會規範及政治有所改變。設想，國家遭受攻擊進入戰爭狀態，國家政制可由分權式進入較極權的體制；同樣地，當貧富差異過大，造成社會不安時，我們亦常見到自由主義社會放棄部分資本主義的效率性，重分配輕效率，傾向社會主義色彩。其中的關鍵在於當這些外在因素（戰爭）或內在矛盾（貧富不均）改變時，自由主義能以成本最小的方式（相對其他意識形態快速且不流血），在尊重個人的前提下，移轉規範及制度進而影響產出。也因此這種意識形態可化解內在矛盾和外在條件的改變，在大部分的情況下達到最有效率之調整。這種效率性的內在邏輯建立於——除非我們否定個體（或個人）適應衝擊的效率性，否則我們無法拒絕由個人最適選擇所匯集整體現象的效率性。^⑨

自由主義從個人最適化的角度出發，以形成國家乃至社會規範的型制，這是共產

註^⑥ 所謂總合一致性是指追求整體最適化時，必須以每一個個體的最適化為基礎，因此當整體達成最適化時，體系內的個體也必達成最適化。

註^⑦ 林火旺，*自由主義與社會正義*（台北：書林出版社，民國八十二年），頁四七～六四；石元康，*當代自由主義理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八十四年），頁一～二五。

註^⑧ John Rawls, *The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ssachusee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138~139.

註^⑨ 作者承認在某些事件下，以自由主義所建立的社會效率性不一定最高，但平均而言其效率性必然最高，因為現實世界中並不存在或是某人有能力做為所謂的全能計畫者（social planner），最了解自己所求所慾的就是自己。

主義、法西斯主義、集體主義或激進的民族主義所望塵莫及的。馬克斯曾經預言，資本主義^⑨（自由主義在經濟上的實踐）終會因資本家及無產階級間的鬥爭而崩潰。但歷史上的經驗告訴我們，資本主義不僅沒有因此崩潰，反而透過勞動政黨的成立、工會、股票市場和分紅制度的設立變得更加茁壯。這也印證了我們之前的推論，具有總合一致性的意識形態本身有將其矛盾內部化的能力，不會產生整個體系的崩潰。

伍、結 論

本文以經濟學的觀點分析意識形態的形成、發展及對於人類群體生活的必要性。在這種分析架構下我們可以進而討論意識形態間的競爭及消失，進而推論人類歷史終結的可能性。這樣的分析架構和傳統社會學及哲學的分析方法有很大的不同，主要的差異在於經濟學者強調效率、競爭、收益及成本，這是過去討論這類問題時，無論是從唯心論或是唯物論的學者們所欠缺的。在這樣的分析基礎上，本文有三個主要結論：

第一、意識形態是人類社會結構的基礎。意識形態的建立可以降低不確定性，因而降低交易間的成本，透過意識形態的建立，制度及生產間的關係才得以穩定。

第二、自給自足的「意識形態—典章、制度—商品、勞務」結構，決定於此體系的自然條件。意識形態具有支配典章制度和決定產出的作用。意識形態和典章制度都具有規模經濟的特性，其所披及範圍的大小決定於技術。如果人類的歷史如同多期的賽局，則意識形態有如進入賽局所投入的沈入成本，典章制度如每期賽局的固定成本模本，商品及勞務種類則有如產出。要迫使體系內的人們改變其典章制度，其和另一個體系的效率差異必須大過固定成本，而造成意識形態的轉變差距必須更大。這種關係類似孔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所提跳躍性的進步類似。^⑩

第三、人類的歷史的終結在意識形態，本文的結論雖然和福山相似，但在邏輯推導上完全不同。雖然本文認為人類歷史應終結在自由主義上，但並未如福山借助於黑格爾的「歷史主義」或是其先驗的「唯心論」。本文切確提出任何終結皆需滿足「總合一致性」及「效率性」。原因在於任何滿足總合一致性的意識形態，其本身會將體系內的矛盾內部化，不會造成整個體系的崩潰。而效率性則使其與他種意識形態競爭時能立於不敗之地。而自由主義正是目前所有人類已知的意識形態中，最滿足此項原則的。另外本文也認為，由於技術的進步，今日在世界的任一角落，沒有一種意識形態可以拒絕競爭，因此人類的歷史必有終結，而且應終結在自由主義下。

註⑨ 這個名詞很容易引地爭議，詳細的討論可見：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頁二～三五。作者認為資本主義為一種經濟制度，和他種經濟制度的最大差別在於，財產權和資源配置權皆屬於個人，因此與人類之自由不可分割。這樣的觀點可見：張清溪等合著，*經濟學理論與實際*（上册），（台北：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民國八十四年八月），頁三五～三六；或見Milton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2)。

註⑩ 同註⑨，p. 49.

以經濟學的方法來探討意識形態和歷史終結的問題，一般而言文獻上並不多。不多的原因一方面在於這個問題過於龐大複雜；另一方面也因為這方面在經濟學科裡不屬顯學，而其他社會科學研究者對於經濟學之方法亦不熟悉。本文嘗試提出一個粗淺的架構，對這個問題作一解釋，並希望能與其他非經濟學者進行對話。其中難免疏漏百出，許多觀點會被嚴厲地質疑。但是如果因此就裹足不前，同樣也就失去科學求真、求善美的精神。

*

*

*

